

《秦风·黄鸟》与周秦文化冲突探论

——《诗经·秦风·黄鸟》之文化背景考析

王鑫磊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周平王东迁后,仍有部分西周遗民留在关中地区。随着在历史渊源、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近似于殷商而与周之间有着较大差异的秦国人入主关中,周文化与秦文化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诗经·秦风·黄鸟》中所反映出的“国人”对“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一事所持的复杂态度,便有可能来源于周秦文化在“从死”问题上的冲突。

[关键词] 《诗经·秦风·黄鸟》;秦;殷商;周;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 J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8353(2009)08 - 0083 - 05

《诗经·秦风》在十五国风中独具一格,其中又以《黄鸟》篇尤甚。这篇为哀悼“三良”子车奄息、仲行、鍼虎,表达自身困惑而作的诗歌,以其真挚的感情,沉郁悲壮的风格,成为《诗经》中最具特色的篇章之一。本文认为,这首诗歌所表现出的“国人”对“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一事所持的复杂态度,可能来源于周平王东迁后留在关中地区的西周遗民后裔与后来入主关中的秦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这首诗歌产生的深层文化背景,在于春秋时期周、秦文化的冲突。

《秦风·黄鸟》是《诗经》所收录的诗歌中创作背景比较明确的一首。《左传》、《史记》对该诗的创作背景都有详细的记载: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

——《左传·文公六年》

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两部史书都明确地提到了“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之事和《黄鸟》诗与此事之间的关联。《小序》也提到:“《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郑笺进一步解释:“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鍼虎也。从死,自杀以从死。”后世学者在为《毛诗》作注或探讨《秦风·黄鸟》诗义时,对于《黄鸟》诗与“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之事的关联以及“哀三良”这一点,也基本认同,鲜有异议。如朱子在《诗集传》中说:

[作者简介] 王鑫磊(1985-),厦门大学中文系。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事见春秋传,即此诗也。”在《诗序辨说》中也称“此《黄鸟》序最为有据。”苏辙《诗集传》、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诗经通论》等专著也都提到了《左传·文公六年》中的记载。方玉润《诗经原始》更是称:“此事(三良从死)见《左传》,凿凿有据,自不必言。”然而历代学者对“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之事的评论,却存在较大的差别。晁福林先生在《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黄鸟探论》一文中将其分为四类,并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具体如下:

第一,谓此事体现了秦地重然诺的民风。

第二,谓此事为秦穆公的昏庸之举。

第三,谓此事的主要责任不在秦穆公,而在于其子秦康公。

第四,自清儒开始,每有议论谓此事责任既非在秦穆公,也不在秦康公,而在于夷俗如此。

——晁福林《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黄鸟探论》

在上面四类观点中,前三种虽各有道理,但也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评论者的主观倾向。第四种则相对客观地反映了“三良”为穆公从死之事的本来面貌。“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一事的发生,是与秦国固有的“从死”制度分不开的。但是,前三种观点之间的巨大差异,却让我们不能不对嬴秦的文化传统与“从死”制度的关系,以及“三良从死”事件与《秦风·黄鸟》的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在《史记》中,殷商和嬴秦始祖感生的传说都有一定的记载,具体如下: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殷本纪》)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秦本纪》)

通过对二者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殷商和嬴秦始祖感生的传说内容颇为相似。特别是“吞玄鸟卵”这个细节在两段记载中都曾出现。殷商始祖感生的传说除在《史记》中出现以外,在《诗经·商颂·玄鸟》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子羔》篇中也分别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契之母,有仍氏之女也。游于中央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划于膺,生乃呼曰‘钦’,是契也”的说法,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相似且无冲突。《诗经·商颂·玄鸟》是赞美商代先祖的诗歌,应当是商族后裔所作,且在当时得到认同并广泛流传的;而上博简《子羔》篇是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献,二者较充分地说明《史记·殷本纪》中有关“玄鸟”的说法是有渊源,且在历史上是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秦本纪》中对嬴秦始祖感生传说的记载虽没有其他传世或出土文献作为旁证,但从《秦本纪》中涉及嬴秦早期历史的内容中出现的大量具有鸟崇拜特征的人名、人称及相关传说(如“鸟俗氏”、“孟戏、中衍鸟身人言”、“飞廉”等)来看,这样的记载也是有一定根据的。相似的始祖感生传说在商人和秦人中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秦人世界观的相似。自上世纪以来,一些学者通过对嬴秦早期历史的研究,提出了嬴秦东来说。按照这种观点,嬴秦来自东夷,并与殷商有密切的关系。这也造成了嬴秦和殷商在文化传统上的近似。从《史记》对嬴秦史事的记载中有关鬼神的内容以及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关于各种鬼怪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文化中,崇拜鬼神的气氛比较浓烈,这一点与殷商人浓烈的重祀信鬼观念有些相似。殷商有着浓烈的人殉风俗。基于相似的文化传统,秦国出现与人殉相类似的“从死”习惯,也是不难理解的。《史记·秦本纪》中讲道:

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其玄孙曰中湣,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自商汤伐桀以来,嬴秦一直为殷商效力,并以此得到信任,被封为诸侯。二者之间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在此基础上,商文化对嬴秦构成较大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后来秦国的某些制度与风

俗,也是合乎情理的。尽管后来嬴秦后代造父因善御而获得周王室的信任,非子又因为善于牧马而受封于秦邑,得以“复续嬴氏祀”。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时期秦人在祭祀制度、用人制度、神权崇拜等方面均有异于周礼,这体现出由于秦邑位于周之西鄙,地理环境所限,嬴秦受周文化影响相对有限。而由于历史上受殷商文化影响很深,秦人在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保留了一些殷商文化特征,殉葬制度就是其中一个方面。这一点,在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遗址所反映出的人殉制度上有所体现。另外,在西周末年西戎叛乱,灭西犬丘大骆之族,秦仲讨戎战死的动荡局势下,嬴秦所崇尚的效忠意识也逐渐恢复,并影响到秦邑以及秦国的普通人,从而形成一种注重尽忠而轻生死的社会风尚。因此,春秋时期秦国出现的“从死”之俗,实际上是秦人效忠意识极端化表现与其文化传统中重祀信鬼观念以及人殉制度的结合体,既包括汉代学者们所提到的因重然诺、崇尚“尽忠”而自杀的所谓“义殉”行为,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殉制度。史书及古人诗文中三良“义殉”与“秦穆公杀三良”两种说法的并存,恐怕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总之,“从死”是极具秦文化特征的社会风俗习惯。而它的盛行,是与秦国的自身历史渊源和春秋初期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

三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秦风·黄鸟》的原文,探讨一下该诗的作者究竟属于怎样一个群体。对于这首诗歌作者的身份,《左传》和《史记》分别表述为“国人”和“秦人”。但春秋时期秦国人的族源和文化背景是比较复杂的。《史记·秦本纪》记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告诉我们秦国收复关中后,接收了平王东迁后遗留在关中岐周地区的遗民。从诗中反复提到的“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内心强烈的矛盾与困惑,以及一种悲愤的情绪。如上文分析,秦国的从死风俗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而三良从死事件与秦的立国相距数代之久。若按照《史记》的记载,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一事发生于秦穆公三十九年,与非子受封于秦邑相距约二百四十年,距秦文公取得岐地也有近一百三十年。如此漫长的时间,足以让秦邑人接受嬴秦的文化传统,认为“三良”从死是忠义守信——至少是合乎制度和社会风气的做法,从而较平静地接受此事,不会慨叹“彼苍者天,歼我良人”了。这时依然为“三良”从死而困惑、悲愤的人们,应该有着某种与秦国从死之俗存在明显冲突,且比较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保留了周文化特征的西周遗民后裔,最有可能是《秦风·黄鸟》的真实作者。

在春秋时期关中地区的居民中,西周遗民是文化背景最为深厚的一个群体。而西周文化取向是与受殷商文化影响较深的秦国存在着明显差异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周文化与商文化及秦文化还存在着某种对立。在鬼神崇拜的问题上,如《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神而后礼。在殷商的社会生活中,神权是至高无上的。祭祀鬼神也被看作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太平的有效方式,而占卜则是人与鬼神沟通的重要手段。从现存的殷商卜辞来看,殷人占卜的内容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战争、迁徙这类国家大事,到做梦这类琐碎之事,都要通过占卜,请鬼神明示。《尚书·西伯戡黎》载殷纣王在“殷之即丧”时仍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可见殷王将自己的存亡成败完全托于天意。对鬼神的极端崇拜,正反映了殷人对人自身力量的不信任。殷人对人与鬼神、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也比较极端。比如做梦这样的琐事,也会被理解为“祖先作祟”^④。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殷人的个体意识,特别是个人权利意识受到压抑,自我牺牲精神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扬。《吕氏春秋·顺民》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裸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顺民》)《尸子》卷上与《淮南子》佚文也提到了商汤以身祷于桑林的事件^⑤。尽管其中的细节可能经过战国及汉代学者的加工,从而融入了这些学者的思想倾向,但商汤欲以自身为牺牲以祈求降雨的情节还是比较可信的。这样的事件,明显地体现出在神权至上的文化氛围中,自我牺牲精神是被殷商人所认同、提倡的。因此,在殷商人眼中,为了维持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使整个族群获得安定生活,残忍的人殉也被看作是可以实施的行为。这样,人牲、人殉风俗就在殷人中间得以流行。殷商文明遗址中为数众多的人牲、人殉遗迹,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上文所述,嬴秦族信奉鬼神的观念也很浓烈。而西周人的天神崇拜和鬼神观与殷商及嬴秦有着显著的不同。周人虽依然尊天命,但并不认为上天赐福与否完全取决于神的喜怒、好恶,而是认为民众的愿望和统治者的德行会影响到天神的意志,具

有一定的人文主义倾向。在这种天命观的影响下,西周统治者接受了一种尊天、敬德、保民^④的思想,相对重视对平民和下层士人的关爱,对于鬼神也并不十分恐惧。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上,也由殷商时期的维护神权转变为制定并提倡“礼乐”。而且,周人比较相信自身的能力,重视人的辛勤耕耘对于国家、社会的意义。基于这样的文化氛围,加之西周前、中期关中地区的镐、丰、岐等地经济比较富足、社会比较稳定,人们的个人权利意识渐渐觉醒,并不断发展,在西周后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以至于在周厉王“好专利”、“暴虐侈傲”的情况下,爆发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周人不认同,更不接受人殉风俗。从关中地区现存的周文明遗迹来看,人殉现象出现的次数与殷商相比明显较低,而且主要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遗址中,可见人殉习俗是不被西周文化所认同的。同样,西周遗民及其后裔也很难接受秦国在与殷商相近的文化传统和军事压力的影响下形成的与人殉相似的“从死”风俗。因此,在“三良”从死的问题上,周、秦两种文化产生冲突,也是正常的。

当然,在与西周遗民长期杂居的情况下,部分秦国普通人受到周文化影响,接受部分周人习俗的情况也存在。一些学者通过考古研究发现,东周时期关中地区的秦国国人的丧葬习俗就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⑤。特别是秦穆公在位的数十年内,政治气氛比较开明,周文化乐生、敬德的思想更易于传播。“献公元年,止从死”事件的发生,也说明东周时期,人殉制度在秦国也处于趋向消亡的状态。因此,也不能排除《秦风·黄鸟》的作者是部分受到周文化影响的秦国人这种情况。从这个角度上讲,《秦风·黄鸟》也体现了春秋时期秦国国人阶层中出现的周秦文化融合的现象。但是,受周文化影响的秦国人对已长期存在,并具有鲜明秦文化特征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表示惋惜、悲愤,也可以看作是周秦文化冲突的一种体现。如今,学者们在探讨《秦风·黄鸟》的产生背景,以及秦“国人”对“从死”制度的态度时,往往将其概括为“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的具体过程,正是周文化与秦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

另外,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中提到:“黄鸟则困而谷(欲)反(返)其古也,多耻者其恧之乎?”^⑥将《黄鸟》篇与“返古”的主题联系起来。在《诗经》中,共有两篇以“黄鸟”为题的诗歌,对于这段简文究竟评价的是哪一篇,目前尚存争议。多数学者依据简文中“欲返其故”的说法认定其说的是《小雅·黄鸟》篇,也有学者认为“返其古”是指“返归古道”,简文所说的是《秦风·黄鸟》篇。从《诗经》中“黄鸟”意象与“思归”、“返故”主题的联系来看,《秦风·黄鸟》应当也包含了一种“思故”的情绪。如果该诗的作者是西周遗民,那么,诗中所思之“故”,除了“三良”,即“故人”以外,更主要的还是故国、“父母之邦”,也就是已东迁的周王朝,以及晁先生所提到的“古道”,即周文化传统。西周遗民思念故周而不接受秦俗,显然是周秦文化冲突的一种体现。在《诗经》中,同名诗歌叙述相似事件,表达相似思想感情的现象并不少见。像《邶风·柏舟》与《鄘风·柏舟》;《邶风·谷风》与《小雅·谷风》之间都存在某种呼应关系。《小雅·黄鸟》中反复提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此邦之人,莫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体现客居者在异乡遭遇与该国人互不理解的状况,并由此产生了回归故国的想法。“客居”这种状况,也可能体现在精神上。西周遗民虽然不是客居者,但由于周天子已经东迁,且无力西顾,他们的家园也成了秦国的封地,他们的身份也转变为秦国国人。因此,在后来入主关中、在政治上处于强势的秦国人面前,他们也就难免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反主为客的沦落感。这种感觉,很容易在一些体现周秦文化冲突的事件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并激起遗民们对于故国的深切怀念。从这个角度上讲,《诗经》中两首以“黄鸟”为题的诗歌之间也存在呼应关系。反映出《秦风·黄鸟》在表达“哀三良”以及西周遗民对周文化传统的坚守的同时,也宣泄了对国家、民族衰亡的悲恸之情。

四

从这个角度来讲,《诗经·秦风·黄鸟》一诗的精神内涵,除了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哀悼三良”以外,还涉及到春秋时期关中地区周文化与秦文化的冲突。春秋初期,秦文公驱逐了占据关中地区的犬戎以后,得到位于关中的岐地,并接收了周平王东迁后遗留该地的西周遗民。而岐地正是周部族崛起的地方——周原的所在地,且是西周王朝重点经营的地区,有着深厚的周文化传统。这里的西周遗民,思想意识上基本保留了西周的文化特征,并把它传给后代。这些西周遗民及其后裔虽然逐渐接受了驱逐犬戎,收复关中的秦国,但在一些事件上,依然会表现出对秦国某些制度或做法的不理解与不接受。这一点在“三良”为秦穆公从死一事

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从死”是具有鲜明秦文化特征的社会风俗,产生于嬴秦固有的与殷商相近的文化传统和秦国立国前后巨大战争压力的共同作用之下。与周文化中乐生、重视人自身价值的观念和西周人的个人权利意识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在“三良”从死这个事件上,西周遗民后裔表现出极大的困惑。“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这段话,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秦风·黄鸟》的作者,也就是西周遗民后裔无法接受“三良”从死的事实,并为其感到惋惜、悲愤,以至于认为苍天杀害了他们的好人。另一方面,作者把杀害“三良”的责任归于苍天,而并没有归罪于秦穆公,也说明作者其实了解“三良”从死本来就是秦俗使然,而非秦穆公有意做出的不仁之举。“若可赎兮,人百其身”则反映了作者对贤德之人的爱戴之情。“人百其身”求的是让三位“良人”得以复生,而绝非作者也想为秦穆公或“三良”从死。这一点,或许是周文化中“敬德”思想在民间的一种体现,而与秦国的从死之俗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部分长期与西周遗民杂居,在其影响下接受周文化乐生、敬德思想及个人权利意识的秦国普通国人,也可能成为《黄鸟》诗的作者,从而使《秦风·黄鸟》在体现文化冲突的同时,也包含了文化融合的内容。

在周衰秦兴之际,周文化乐生、敬德的价值观念仍为西周遗民后裔所坚守,并得到一些文化人的认同,形成一定影响力。可见其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能够超越固有的族群界限进行传播,上升为各族群普遍认同的观念,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本文谨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诗经·秦风·黄鸟》一诗的产生背景和文化内涵提出一种推测。文中不足之处,还望各位学界前辈多多赐教。

[注释]

孔颖达:《毛诗正义》,见《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2页。

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朱熹:《诗序辨说》,见《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4页。

晁福林:《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黄鸟探论》,《江海学刊》,2002年第5期。

廖名春:《上博简·子羔篇感生神话试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祝中熹:《早期秦史》,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见《秦俑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⑪刘源:《殷商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7页。

⑫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⑬⑭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第130页。

⑮田亚岐,赵士禎:《东周时期关中地区国人秦墓棺槨的演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⑯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责任编辑:曹振华]